

香港沦陷时期抗日活动



香港总督府举行受降仪式之全景。前左起第二人为中国代表潘华国少将。



日军将领将佩剑交予盟国受降代表夏愆海军少将,正式投降。



乌蛟腾“抗日英烈纪念碑”

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,又称东江纵队,当时不只活跃在东江一带,沦陷时期的九龙、新界及香港各离岛都发现过他们的踪迹。香港之战爆发后,他们不仅协助当时滞留香港的八百多名抗日爱国人士脱离虎口,还经常给日寇造成破坏、伤亡。

当时在港九活跃的游击队中,以刘黑仔(1920—1946)的声威最盛。他枪法如神,机智勇敢,不少日军军官及土匪头目丧命于他的神枪之下。他的威武事迹,曾使敌人闻风丧胆,那些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密侦们,还把他视为神出鬼没的神秘人物。但刘黑仔的真名是什么,他们却不大清楚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前,东纵部队在香港设有几个秘密联络站,当时和宋庆龄接头的是黄作梅(1916—1955)。黄作梅一向潜伏在香港工作,抗战胜利后去了伦敦,在一家英文报纸工作。黄作梅原籍广东番禺,在香港出生,中学在皇仁书院攻读,毕业后往英国进修。抗战爆发后,黄作梅投身东江纵队,主持国际工作小组,任务是营救囚禁在日军集中营的英俘成员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从陆路进攻香港。这时东江纵队就以积极的行动,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。除了在铁路线上伏击日军,破坏敌人运输外,更挺进九龙,给敌人后方以有力袭击。那时香港一带盛传中国游击队攻入深圳,就是指这个部队。

当日军攻占香港后,东纵决定由第三大队派出黄冠芳、江水、刘黑仔等率领武工队进入沙头角、西贡、大埔附近地区;第五大队派出周伯明、曾鸿文、黄高阳等率领武工队进入罗湖、元朗、沙田等地区。游击队分别从惠阳方面和宝安方面分三批插入新界:一路由沙头角进入南涌、鹿头、乌蛟腾、七木桥、横山脚等村,以后渗透到上水、粉岭的坪洋、鹤藪等地和八仙岭山区;一路过大鹏湾上吉澳岛,稍事歇脚,然后再坐船到西贡,上北潭涌、榕树坳,又活跃在沙田观音山、吊草岩一带,并落牛池湾,伸入九龙市中心区,一路到元朗八乡、十八乡,以后东连大埔,西出荃湾,互相呼应。

游击队进入港九地区后,首先收集了英军溃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,共有轻重机枪三十多挺,步枪数百支,以及大批弹药、作战物资。接着在元朗地区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汉奸,消灭和赶走了盘踞在大帽山的两股土匪,控制了大帽山。与此同时,在西贡地区打击和迁走了两股土匪,消灭了李观姐股匪六十余人。

1942年3月,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港九大队,大队以下分区建立中队。1943年12月,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令成立东江纵队,司令员曾生、政委林平、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、政治部主任杨康华。在港九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仍称港九大队,并派出熟悉港九情况的原香港淘化罐头厂工人蔡国■任大队长,

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,黄高阳任政治处主任。由于所处环境特殊,改称为港九独立大队,直属东江纵队司令部。

挺进港九的短枪队,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,把当地土匪大部分消灭或驱逐,在各地获得了立足点。并通过发动群众,建立了抗日自卫队、常备队、护村队等,形成了群众自己的武装组织。1943年春夏以后,各个地区以短枪队为基础,先后组建了西贡中队、沙头角中队、元朗中队、大屿山中队、海上纵队。此外为了加强市区的游击战,还成立了市区队。

港九地域狭小,回旋余地不大,而又是敌人军警林立的地区,港九大队进行的游击战,主要采取隐蔽斗争形式,着重发挥短枪队机动灵活的特点,运用奇袭、伏袭等游击战术打击敌人。因此,各地区中队均编有短枪队,大队也有一个直属的短枪队。他们采取高度灵活的斗争策略,在沙田地区展开活动,以观音山、吊草岩一带为依托,频频出击,经历了数十次战斗。观音山、吊草岩一带是在日军包围中的小块三角地,共有十多个村庄,稍有麻痹就会遭到敌人的袭击。为了安全,短枪队白天化装活动,派出自卫队到各个路口放哨,还在周围建立了十多个营地,经常变换驻地。日军在许多村庄安插了汉奸、密探,搜集游击队的情况,短枪队把肃清当地的汉奸走狗作为头项任务。他们先后肃清了沙田围村、沙田头村的汉奸密侦,拔

掉了敌人的爪牙,堵塞了日军的耳目。

香港的第一座烈士纪念碑,是在船湾郊野公园范围之内。从沙角道可通至该纪念碑的所在地,地名为乌蛟腾村。该处位于八仙岭附近。这个纪念碑建于1951年10月,原名“抗日纪念碑”,获港英政府同意兴建。1985年9月重修。重修时由曾生题字,写上“抗日英烈纪念碑”7字。重修后,通往纪念碑入口处增建一指示牌坊,沿途铺有石路。纪念碑更刻上碑文介绍乌蛟腾抗日事迹,李世藩、李宪新、李天生、李志宏、李伟文、李官盛、王志英、王官保等烈士,也被刻上名字。

1942年9月25日(中秋节翌日)早晨,日军出动数百兵力,包围了乌蛟腾村。全村人被赶到空地集中,然后挨家挨户去搜查,但既搜不到游击队,也搜不到枪支。日寇十分恼火,就对区役所指定为村长的李世藩进行审问。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,李世藩坚贞不屈,没供出半点情况,惨被日军火烧及拷打灌水逼害,四十多岁的李世藩,最终在押解途中牺牲。

另一位村长李源培,则因被烤时伤重昏迷,令日军产生错觉才幸免于难。日军把李源培拉到河边,拷打灌水,用军马践踏腹部,在李源培背上烧熟烟丝,烧得他皮开肉烂,昏了过去又用水泼醒,醒了又再烧,如此轮番折磨,李源培已是奄奄一息,日寇仍然一无所获。天也快黑了,他们只得悻悻然收兵回去。

两名村长的英勇事迹,激起村民同仇敌忾,乌蛟腾村至1945年抗日胜利仍未被日军占领。香港重光后,村民缅怀历次在抗日中牺牲的兄弟,马来西亚一位华侨更捐款建议建纪念碑,悼念烈士抗日的事迹。这个纪念碑终于于1951年10月在一处叫作“三担箩”的地方落成,死里逃生的李源培更是其中一个主持揭幕的嘉宾。烈士纪念碑高约丈余,白色素底,碑顶有一颗红星,碑石上除七位烈士的芳名外,还刻有“各位烈士芳名永垂不朽”的字句。在苍翠的松柏围绕下,显得分外庄严。

根据纪念碑刻文记:“1942年9月25日,日本侵略者拂晓包围乌蛟腾村,强逼群众交出自卫武器和供出游击队员,村长李世藩、李源培挺身而出,不怕灌水,不怕火烧,不怕军马践踏,坚贞不屈,李世藩壮烈牺牲。”入口牌坊上上一副楹联:“纪昔贤满腔热血,念先烈弥世功劳”。建碑之际,当年曾获游击队拯救的港府官员和英军军官参加了开幕仪式。

第二座抗日纪念碑已于1988年落成,地点是西贡北约北潭坳分路往赤径路右上侧山坡一处官地,这座纪念碑是经过多次申请和要求,港英政府才允许拨地建筑。碑身用石材建成,外层用中国云石。石碑上刻有一篇碑记,记述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当年在西贡的英烈事迹。

西贡区当年抗日牺牲人士的名字,刻在纪念碑上,以慰英灵。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